

历代文学读本

周啸天 编著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前言

周啸天

中国文学源远流长，品类甚繁，名家辈出，瑰宝极多，以特有的风姿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。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把文学提到事关教化的高度来认识，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、爱好和提倡文艺，尽管改朝换代，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到近代小说、戏曲，中国文学三千年一脉相承，未尝中断，为世界文学史所仅见。

语言先于文字，故口头创作先于书面创作。在未有文字之前，中国上古即有许多神话传说，这些传说被片断地记载于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等古籍中。如“女娲补天”、“鲧禹治水”、“后羿射日”、“夸父逐日”、“精卫填海”、“黄帝战蚩尤”等，或表现了先民对征服、支配自然力的渴望，或反映了原始部族间的斗争，颇具悲剧意味与崇高美感。虽然是口头创作，却以瑰丽想象与英雄崇拜，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。

除散文的情况较为特殊，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，大多起源于民间，再经文人的染指而登上文学的圣殿。原始歌谣起源于劳动，拉开中国诗史的序幕。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民间和上层诗作三百余篇，当

时称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。这些诗反映了周人农牧渔猎、婚恋风俗、建筑娱乐、部族繁衍、徭役战争方方面面的生活状况，生动表现了周人的七情六欲及宇宙人生、伦理道德、历史文化、宗教哲学等各种观念。既有《卫风·氓》、《邶风·七月》那样委曲周详的叙事诗，也有《周南·关雎》、《秦风·蒹葭》那样优美动人的抒情诗。诗中活动着从天子贵族到农奴隶役等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场面，从而成为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，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。《诗经》是一部声诗，抒情之作多用叠咏的结构程式，普遍采用四言体，按音乐分为风、雅、颂三大类，开创了赋、比、兴的表现手法，其比兴手法对历代诗歌的影响极为深远。《诗经》还确立了乐府声诗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优势，汉魏六朝乐府、唐人绝句、宋词元曲及明清时调戏文，即与之一脉传承。

文字的发明结束了结绳记事的蒙昧历史。最早的记事之文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，而具有文学意义的散文则出于史官之手。《尚书》之殷商文告翻开了中国历史散文的第一页。《尚书·盘庚》记录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、百姓和庶民的讲话，《周书·无逸》记录周公诫成王之辞，行文简古，佶屈聱牙。古代社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根本变革，政治上的列国纷争、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及民本主义的新思潮，使历史散文呈跃进性发展，而诸子散文亦得到勃兴。被认为是左丘明演绎孔子所纂编年体大事记《春秋》的《左氏春秋》即《左传》，是以记人叙事为中心的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史，它特别擅长描写战争，不把战争看做一种简单的刀光剑影的搏斗，而看做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十分关注交战双方的政治情况、人心向背、军事准备及外交斡旋，对战争场面描写则快文得机，而且着重于战术的较量，使人感到战争胜负诚非偶然。如“齐鲁长勺之战”、“晋楚

城濮之战”、“秦晋崤之战”、“齐晋鞍之战”等，围绕战争刻画人物，莫不情态毕现。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是先后出现的两种国别史，写人尤长于记言。《战国策》侧重记载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活动和蛊惑人心的辞令，如“苏秦始将连横”、“冯谖客孟尝君”、“鲁仲连义不帝秦”等篇，人物个性鲜明，语言铺张扬厉，已具小说手段。

时代风云的激荡，学术文化的普及，使得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大批政治家和思想家，世称先秦诸子。诸子来往穿梭于列国，从事游说讲学活动，写作了大量政治与哲理散文，史称诸子散文。诸子散文云蒸霞蔚，既有结构谨严、说理透辟、感情充沛、善于譬喻、富于文采等共同之处，同时又各具特色。《论语》是孔门师弟的论学语录，可贵在它的实录和语体，不但如实记下人物的实话真话，而且能再现其仪态举止、音容笑貌，语言洗练，复能警策。如“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”中，弟子挨个谈心，孔子随意评点，令人如坐春风。《孟子》记孟子言行，张扬主体人格，由孟子与门人万章等编纂而成。书中充分展现了雄辩的风采，如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从性善论出发，提出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”的观点，并为仁政王道勾勒蓝图；“鱼我所欲也章”谈人生抉择，提出“舍生取义”的重大命题，莫不譬喻警策，说理透辟，气势磅礴，辞锋犀利，擒纵自如。《墨子》主张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节约，系墨翟弟子与后学编纂而成，重在经世致用，长于类比推理，逻辑性强，语言质朴无华，缺少文采。而《公输》一篇，颇近小说。荀子是最早以“赋”名篇的作家。

《荀子》由三十余篇专题论文组成，乃荀子及后学所撰。荀子主张性恶，强调后天的学习。《劝学》一篇多用排比，以博喻说理，是古代哲理散文中少有的佳作。《老子》长于思辨，极富中国智慧，采用韵语，堪称玄言诗之祖。《庄子》是先秦道家典

籍，内篇是书中精华，一般认为是庄子自著。庄子将社会黑暗归罪于文明，主张复返自然，追求精神自由。《逍遥游》等篇，想象奇特，博采寓言，语汇丰富，极富浪漫色彩，在晚周诸子中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。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。《韩非子》中《五蠹》等政论文，论辩周详，语气专断，文风峭刻，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。书中寓言较多，文学意味颇浓。

先秦诸子争鸣于中原之日，诗歌又在江汉流域找到新的沃壤。如果说《诗经》是一部不同地区、不同阶层、以无名作者为主的创作汇集，那么，《楚辞》则是“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（黄伯思），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的诗歌总集，从中产生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，以及宋玉等一批知名作家，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个体创作的时代。国风多抒情短篇，雅、颂有增长的趋势，而屈原的《离骚》、宋玉《九辩》等，皆结构宏伟严密，笔参造化之作。屈原《九歌》11篇是在楚地祀神曲的基础上加工润色，再创作而成，其中《国殇》为悼亡楚国阵亡将士之作，风格慷慨激昂；《天问》是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写成，着重表现诗人的历史观和自然观，显示了哲理与抒情的两重性；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是屈原的政治抒情之作，表现了诗人遭遇流放的愤懑和眷念祖国的情结，有事可据，有义可陈，情感充沛，意象纷繁，气势磅礴，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，代表着《楚辞》的最高成就。屈辞和庄子是继神话以后，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两大宗师。宋玉《九辩》则是寒士失职的不平之鸣，开启了中国文学感伤与悲秋的传统。《楚辞》句式较《诗经》有所加长，以六言为主，有规律地使用语气词“兮”。

西汉的鼎盛时期，汉武帝在文学上提倡通过写作辞赋来“润色鸿业”，从楚辞到汉赋，基本上是一个由诗到非诗，即辞体散文化的过程。枚乘《七发》为汉代大赋奠基，司马相如《子虚

赋》、《上林赋》标志着汉代大赋的成熟，扬雄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亦相羽翼。汉代大赋多设为问答，铺陈都邑的繁华、宫苑的富丽、物产的丰饶以及天子的声色犬马之乐，亦略寓规谏，史称“劝百讽一”。其词藻华赡、手法夸张、韵散结合，有图案化倾向。由于大赋客观反映了大汉帝国的物质繁荣和民族气魄，曾被视为有汉一代之文学。东汉国力渐衰，抒情小赋兴起，如张衡《归田赋》、赵壹《刺世疾邪赋》等皆一时之选，赋体又出现诗化的苗头。魏初诗赋追求华丽，辞赋讲求对仗和藻绘，曹植《洛神赋》已表现出这样的特点，而句式灵活，行文流畅；王粲《登楼赋》则以简洁明快，名高一时。

从春秋到西汉五百年间，社会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发生急剧变化，涌现了大量历史人物，所作历史贡献不可亦不容磨灭。大手笔的产生，是历史的呼唤。司马迁怀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宏愿，继承父业，忍辱负重，发愤著书。《史记》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，又是一部纪实性、史诗式的文学巨著。其主要组成部分的“本纪”、“世家”和“列传”，具有很高的史传文学价值。《史记》中实含一部“楚汉风云录”，展示了一道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画廊。除五百年间的军政要人而外，兼有学者、平民、商人、妇女、医生、游侠、卜者、方士、倡优之类人物，共计四千餘，其中性格鲜明者近百人之多，有的达到了典型的程度，如领袖人物刘邦、项羽，商政两栖人物吕不韦、范蠡，将相中的韩信、张良、廉颇、蔺相如，酷吏中的杜周、张汤，游侠中的朱家、郭解，刺客中的聂政、荆轲，滑稽家的淳于髡、优孟，官僚中的石奋、叔孙通等等。《史记》在塑造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上，为后世古文、小说和戏剧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，堪称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（鲁迅）。《史记》开创的纪传体，为班固《汉书》所继承，成为历

代正史沿用的体裁。《汉书》作为历史著作从体例到写作方法上，都更完整、更严密也更正统，部分史传亦有文学价值，如《苏武传》记叙汉臣苏武含辛茹苦 19 年，宁可北海牧羊，不改民族情操的事迹，文章对后代产生的思想教育作用，不可低估。

乐府的设立虽先于汉代，而汉代设立乐府，则在汉武帝时。汉乐府诗是继国风之后，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，它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新篇章。汉乐府诗多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（班固），有比较完整的情节，颇能描摹人物的口吻神情，较国风中的叙事之作，演进之迹甚明，开拓了叙事诗的新阶段。汉乐府诗多反映战争徭役造成的民生疾苦，封建礼教造成的婚恋悲剧，间有揭露讽刺上层人士之作，女性题材占着重要地位。《焦仲卿妻》以冷峻的生活观察力、深厚的同情心和力透纸背的描写，再现了在封建家长的压迫下，一对寻常夫妻的不同寻常的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，洋溢着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。《陌上桑》写一位太守对采桑女进行骚扰，而碰一鼻子灰的喜剧故事。爱的坚贞在诗中并不是一个抽象的、违背人性的教条，而是同美满爱情和幸福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的，尤其高明。它们从两个方面代表了汉乐府的最高成就。

汉乐府开始了五言诗的时代。五言体较四言体的句容量大为增加，更适宜自然呼吸的节律。五言诗的特点是把《诗经》变化多端的章法、句法和韵法整齐划一，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，更宜于抒情达意。这种诗体得到文人效仿，在东汉遂取代四言诗成为诗坛创作主流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。“十九首”全是短篇抒情诗，虽非成于一人之手，却有共同的时代主题——汉末动乱时世中寒士的失落和寻常夫妇的两地相思。如“行行重行行”、“青青河畔草”、“涉江采芙蓉”、“迢迢牵牛星”等篇，无不情景交

融，语言平易，“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”（谢榛），无一处不妥帖，无一处不生动；诗中颇多人生哲理的思索，如“去者日已疏，来者日已亲”，虽不免结穴于悲观，然“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”（钟嵘），故被誉为“五言之冠冕”（刘勰）。

建安时代天下大乱、军阀混战，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，一方面反映着社会的动乱与民生的疾苦，充满悲天悯人的情调；一方面便是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，收拾金瓯的使命感或雄心壮志。“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。”（刘勰）一个突出现象，是以曹魏为政治依托，出现了一个作家群——邺下文人集团，包括曹氏父子、建安七子和蔡琰。曹操是改造文风的祖师，为文清峻通脱。其诗兼长四言、五言，如《蒿里行》、《苦寒行》、《短歌行》、《步出夏门行》等，多以乐府古题写时事，或悲天悯人，或自抒襟抱，诗风古直悲凉，堪称建安文学之父。曹植是建安时代享誉最高的作家，他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，诗风清新活泼，风流自赏。他注意用词的形象生动、词采的华美、韵律的和谐、诗篇的起结，并努力锤炼警句，开了六朝绮丽的先河。《白马篇》写边塞题材，《赠白马王彪》是五言抒情的空前长篇，都是首开风气之作。此外，曹植的散文和辞赋也有相当的成就。蔡琰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女诗人，她本是东汉大学者蔡邕的女儿，乱世中被董卓部胡兵所掳，辗转到南匈奴，婚配生子，建安中为曹操赎回。所作《悲愤诗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自传体长篇叙事诗，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汉末大动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，特别是战争对女性的摧残，诗风激昂酸楚，震撼力甚大。总之，建安诗人多于鞍马间为文，思想内容充实，艺术风格悲凉慷慨、刚健有力，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，文学史家谓之“建安风骨”，对于唐诗有不可忽略的影响。

魏晋之际是“乱和篡的时代”（鲁迅），统治者倡言名教而政治迫害滋多，老庄玄学行时，佛教亦乘虚而入，士人谈空说有，行为流于放诞，文学遂成苦闷的象征。正始与建安时间相隔不过20年，而文风一变。积极入世、反映现实、慷慨悲歌成了过去，代之而起的是时而师心使气、时而讳莫如深的作风，代表作家为嵇康、阮籍。嵇康从社会关系到思想感情都与司马氏集团不合，又轻肆直言，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为文思想新颖，文字泼辣，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借题发挥，触犯当局的政治忌讳，招致杀身之祸。阮籍亦不满现实，却更善明哲保身，他是曹植以后在五言诗创作上贡献卓著的诗人，《咏怀》诗80余首表现找不到人生归宿、歧路彷徨的苦闷，总体内容可以简单地用“哭途穷”来加以概括，而“文多隐避，百代之下，难以情测”（李善）。《咏怀》诗开创了一个抒情诗品种，后来庾信的《拟咏怀》，陈子昂、张九龄的《感遇》和李白的《古风》，大体处于它的延长线上。

从魏晋到南北朝时代，中国文人逐渐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特点，使创作逐渐成为自觉的艺术活动，从而开始了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。文史的界定渐渐清楚，正史的文学色彩冲淡的同时，诗文自身的特点却日益突出。佛经的传入，对中国文学的思想、语言和音节都产生了影响。声律学和骈偶学的出现导致诗歌创作声色大开，促成新体诗亦即律诗的兴起。律诗的最大特征是“丢开汉诗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”（朱光潜），从而成为中国诗歌的又一转关。西晋太康间，潘岳、陆机等在拟古的同时，追求形式的华美，“采缙于正始，力柔于建安”（刘勰）。唯左思《咏史》议论风生，对“世胥躐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的门阀制度极度不满，《娇女诗》在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儿童为描写对象，赞美人性的天真，具有新意。

清淡风气进一步影响文学的结果，是“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”的玄言诗泛滥，直到晋宋易代之际，才出现了一个注重实践的大诗人陶渊明，给诗坛带来了新的内容和风格。从汉末“十九首”到阮籍，诗人苦苦思索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，却走不出人生的苦闷。惟独陶渊明通过从复返田园、参加劳动、享受亲情、从事精神创造活动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，成就了中古时期一种新的具有田园色彩的士大夫典型，成为“六朝第一流人物”（沈德潜）。陶渊明从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，在《诗经》农事诗基础上，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诗歌品类——田园诗。田园诗的精神也渗透了陶渊明的散文辞赋：《桃花源记》虚构了一个无政府的和平温馨的农业社会，“世外桃源”成为中国诗文最有名的典故之一；《归去来辞》是诀别官场和旧我的宣言书，也是优美动人的田园生活画卷，它完全突破汉魏抒情小赋的格局，成为辞赋史上划时代的杰作。以《归园田居》、《饮酒》、《移居》为代表的陶诗，达到平淡与醇厚的统一，情景与哲理的结合，平实而有深度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学风格，迥异于魏晋以来渐趋绮靡的诗风。陶渊明开创的田园题材和浑成诗风，对唐诗影响很大。事实上唐宋大诗人都不同程度受到陶渊明的影响，苏轼的人品与风格尤相接近。堪称唐诗先驱的作家还有鲍照，其五言诗风格清新俊逸，而七言歌行如《拟行路难》等篇更富于独创性，这种体裁后来成为“唐人的拿手好戏”（萧涤非），其首创之功不可埋没。

“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老庄告退，山水方滋。”（刘勰）谢灵运为永嘉太守，用诗描绘了浙江、彭蠡湖的自然景色，成为陶渊明以后专攻山水诗的诗人。由于汉字四声的发现，在齐永明间诗人沈约等提倡下，出现了回避声病、讲求调声的新体诗，是当时诗界的一件大事。诗人谢朓以永明体写山水诗，工于发端，

语言清新，颇有警句，与谢灵运并称“大小谢”。新体诗在梁、陈宫廷演变出一种以咏物、艳情为主，诗风轻艳的诗体，时称宫体，主要作家是梁简文帝萧纲及徐摛徐陵父子、庾肩吾庾信父子。宫体诗比永明体更趋于用典、藻绘和格律化。

从魏晋到六朝，散文和辞赋也渐趋骈俪，表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，骈赋、骈文讲求声律、对仗和用典，句式上渐趋四六，是充分展示汉语特有魅力的美文。骈赋用韵，刘宋时代以鲍照成就为高，《芜城赋》写兵燹以后的广陵，抒发沧桑感慨，影响较大。梁代是六朝辞赋的全盛时期，当时宫体诗人大都兼长辞赋，作风与其诗并无二致。而江淹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后世传诵不衰，堪称双璧；陶弘景《答谢中书书》、吴均《答朱元思书》是简洁精致的山水小品；孔稚珪《北山移文》是讽刺俳谐的佳作。庾信是六朝骈体最杰出的作家，他早年随父庾肩吾及徐陵父子出入宫禁，陪同萧纲写作了一些绮艳的诗歌，称“徐庾体”。所作《春赋》等，已独步一时。中岁经历侯景之乱，出使西魏被强留长安，对动乱时世和北方景物有较深的感受，《哀江南赋》并序写国破家亡、身世飘零之痛，可谓梁末史事的实录，感情深挚而文采斐然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，是骈体空前绝后的大制作。

东晋以来，长江流域经济增长，商业发达，城市繁荣，世风奢靡，音乐文艺蓬勃发展。南朝乐府机关采集民歌，主要满足统治阶层声色娱乐的需要，所以现存南朝乐府内容比较狭窄，绝大多数是情歌，文人加工的痕迹较为明显。南朝乐府以五言四句体为主，歌曲数百种，以《子夜歌》系列最受欢迎。《西洲曲》在五言四句体的基础上，发展成为长篇，全诗如多首五绝组成，声情摇曳，首尾呼应，堪称南朝乐府最成熟、精致的作品。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，陆续传到南方，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存。与南朝乐府相比，北朝民歌口头创作居多，以谣体为主，数

量较南朝民歌为少，而内容比较开阔，艺术表现质朴刚健，生气勃勃。《敕勒歌》虽由鲜卑语译来，却是北朝民歌的上乘之作。

《木兰诗》歌颂一位女性代父从军的事迹，诗中写木兰固然英雄，却毕竟是一位女性，用笔明快而细腻，唱叹有情，是北朝民歌的杰作。

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，笔记小说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体裁。笔记小说又有志怪与轶事之分。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、鬼魅妖怪、殊方异物、佛法灵异等内容，它的兴盛显然受了佛经的刺激，虽多宣扬宗教迷信，却也保存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。干宝《搜神记》堪称聊斋鼻祖，《李寄》一篇写闽女斩蛇自救，为一方除害的故事，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，驳斥男尊女卑观念，极具反封建意义；《董永》写织女下凡救助孝子，后为《天仙配》故事之蓝本。此外，蜚声海内外的“梁祝故事”，亦成于萧梁时期（陈寅恪说）。轶事小说记述名士的轶闻琐事、言谈举止，从中可以窥见时代和人物的消息，以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为集大成者。《世说新语》以对名士言行片断记载，真实勾勒了士族生活风貌及心态，极善画龙点睛，语言简约含蓄，隽永传神，是唐宋诗词取资的一大渊薮。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，产生了一些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《文赋》等单篇文论，对诸如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、文学创作和文体的特点等问题，提出了重要见解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更是一部博大精深、具有系统性、总结性和创造性的文论专著，其下篇论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，对诸如艺术想象、艺术创作的主客观关系、作家的才具修养对创作的影响、继承与创新、创作技巧等问题的探讨，尤为全书的精华所在。锺嵘《诗

品》主张诗贵“吟咏情性”，反对刻意追求声律、滥用典故等习气，并对前辈诗人的创作及继承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批评，对中国诗话的形成和发展，有开创之功。以上文论著作还提出了诸如“神韵”、“境界”、“形象”、“风骨”等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范畴，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。萧统《文选》选录自先秦至萧梁七八百年间重要文学作品，入选诗文的标准是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体现了将文学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的努力，对李唐一代作家的文学教育，发挥了极大作用。

隋唐时代结束了自东汉以来数百年动荡分裂局面，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被打破，政权逐步向庶族人士开放。大唐帝国长时期经济繁荣，国家统一强盛，南北文学的渗透融合，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，政治开明，文禁松弛，给文坛带来新的生机。唐代文学写出了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极为光辉的篇章，这一时期除戏剧以外的各个文学部类，如诗词、散文、小说都取得了划时代的，甚至是空前绝后的成就。

唐诗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纪元，六朝开始的新体诗运动得到最终完成；五七言古近体诗体裁大备；唐诗诗歌数量，超出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间存诗总数的二至三倍；在群众参与创作的基础上，每隔几十年就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批成就卓越的诗人，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超过从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。在唐初即产生了如“四杰”等宫廷外的优秀诗人，从内容上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天地，使五律完熟定型，七古面目一新。陈子昂正式反对齐梁，倡言风雅兴寄、汉魏风骨，打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帜，始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唐诗发展端正了方向。开元天宝之间，诗歌发展呈跃进性趋势，积极浪漫主义诗风成为时代主流，大批卓越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。李白生活在开元天宝时代，一方面感受着

欣欣向荣的时代氛围，一方面又察觉到社会潜伏的危机。他一生长期栖山林而心存魏阙，做过皇帝的客卿，更是市井平民的朋友，因爱国心切而系身囹圄、曾被流放，不平凡的生活造就了他不平凡的思想性格：既怀儒家“济世”的人生理想，又对现实存在极端不满，思想行为放荡不羁，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，遂能“并屈庄以为心”（龚自珍）。他通过对壮丽河山的歌唱，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，抒发蔑视世俗、笑傲王侯、纵情欢乐、恣意反抗的情怀。其创作状态是天马行空，不拘格律，随意挥洒，十幅一息。至如《蜀道难》、《将进酒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等篇，“可谓奇之又奇，然自骚人以还，鲜有此体调也。”（殷璠）时代的特点结合着诗人的独特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，使李白将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高度统一，成为屈原以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。李白而外，以岑参、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，以王维、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，云蒸霞蔚，共同创造了盛唐气象。岑参长期深入边塞，足迹遍及天山南北，以审美态度歌咏边塞的一切，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》等篇尤富奇情壮采，堪称西部诗人。王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，以丹青妙手为诗，诗中有画，《辋川集》诸诗，颇具禅机。盛唐文艺洋溢着音乐的精神，得到长足发展的诗体是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，王昌龄将边塞和妇女题材入七言绝句，以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和醇厚的艺术境界赢得“诗家天子”之称。

安史之乱前后，现实主义逐渐取代浪漫主义而成为时代潮流。杜甫横跨两个时代，是与这个大动荡时代、与苦难民众同呼吸、共命运的诗人。他以丰富真切的生活体验、深沉博大的儒学情怀、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，关注时代民生，以时事入诗，再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，以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及《北征》等为标志，达到了写实的极致，成功了一代“诗史”。杜甫是传统

诗艺的集大成者，是文人叙事诗第一大宗师，又是唐代最善于驾驭各类诗体的诗人，几乎每一种诗体在他的手里都得到新的发展。七言律诗在众体中最要炉锤的工夫，这种形式初盛唐少有作者，到《秋兴八首》等大量作品产生，始成重要诗体，而杜诗在总体上亦以沉郁顿挫、千锤百炼为特色。大历时代的诗人，在生活、思想、艺术上都无力追踪李杜，大都远宗谢朓、近继王维，寄情山水和日常生活，审美趣味偏于清空幽隽。而“诗到元和体变新”（白居易），出现了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大潮和新乐府运动。中晚唐诗歌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，杰出诗人除白居易外，还有韩愈、元稹、张籍、王建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贺、杜牧和李商隐，即使并称如元白、刘白、韩孟、韦柳、张王及小李杜，莫不同中有异，各具风采。白居易推尊杜甫，提倡诗歌“为时而作”、“为事而著”、为政治服务，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人物，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组诗是其诗论的光辉实践。《长恨歌》等叙事诗，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，突破其诗论的局限，遂成千古绝唱。韩愈则从艺术创新的一面发展杜甫，开新奇瘦硬的诗风，对宋诗有较大的影响。刘禹锡怀六朝情结，得民歌神髓，所作《金陵五题》、《竹枝词》等七绝，影响深远。李贺歌诗从楚辞、南朝乐府挹取芳润，多以怀才不遇和恋情为题材，创造了一种迟暮黄昏的梦幻情调，在手法上特重象征和感性显现，开启了晚唐唯美主义的诗风。晚唐杜牧清新俊爽，李商隐包蕴密致，在艺术上分别处在刘禹锡和李贺的延长线上，在七言律诗、七言绝句的创作上尤为出色。杜牧尤长于七绝。所作《阿房宫赋》，首开文赋的先声。李商隐七律如《锦瑟》、《无题》诸诗，注意语言、对仗、声律和典故的精心选择和组织，形成精丽而富于暗示的诗风，是中国古典诗歌通向词境的一大转关。唐末虽未出现大诗人，而罗隐、聂夷中、杜荀鹤等人以关注民生、批判弊政的

出色作品，对新乐府运动作了有力的回应。

东汉以来文章渐趋整饬，骈文统治文坛达数百年之久，导致古代散文传统的失落。六朝人即有反骈复散的呼声，至初唐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，文体一变。盛唐时李华、萧颖士、独孤及、梁肃、柳冕等文士，坚持道统文学理论，为古文复兴铺平了道路。安史乱后，藩镇割据，佛道盛行，部分中小地主阶级人士为了挽救社会危机，巩固中央集权，积极从事政治改革，提倡儒学复兴，在文学上要求自觉地为这一目标服务。韩愈提出“古文”这一概念，倡导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、以奇句单行为主的，取法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，取代流行的骈文，写出了典范的作品。他又热心奖掖后进，吸引了一批追随者。另一杰出古文家柳宗元，亦与之桴鼓相应，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。所谓古文运动，实质上是在“文以载道”的前提下，从文体、文风和文学语言上都进行变革的散文革新运动。韩柳古文在议论文、传记文、抒情文上都有很高成就。韩愈所作杂文性质的作品如《进学解》、《杂说》、《李愿归盘谷序》等颇有特色；而柳宗元则在先秦诸子的基础上，创作了《三戒》等篇独立的寓言作品，在酈道元《水经注》的基础上，创作了“永州八记”等独立的山水游记文。古文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，使得贞元、元和二三十年间，古文逐渐压倒骈文，形成气候。唐末骈文复炽，小品文却放出光辉，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等人针砭时弊之作，被鲁迅誉为“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。

“小说亦如诗，至唐而一变，虽尚不离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婉转，文辞华艳。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。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。”（鲁迅）进士行卷的社会风气，为传奇小说造就了有才气的作家队伍；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，给唐传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；变文、俗赋、话本、词文等通俗说唱

文艺为士林喜好，凡此对传奇的内容和形式皆有影响。古文不便叙事的骈文，为传奇作家提供了便于表达思想生活内容的文体。唐人传奇不再侈谈神怪、因果，而多含有人生和社会的重大命题。传奇题材涉及侠义、神怪、历史、讽刺等等，而以中唐的爱情之作如《柳毅传》、《李娃传》、《霍小玉传》以及成为《西厢记》故事蓝本的《莺莺传》等，成就最高。它们大多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，谴责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，运用写实手法刻画人物性格和环境气氛，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，艺术表现上也臻于完美。无论是虚构创作、还是依据一定生活原型，多具典型的环境和鲜明的人物性格，能表现一定的生活哲理。讽刺题材的传奇如《枕中记》、《南柯太守记》，侠义题材的传奇如《谢小娥传》、《虬髯客传》，或否定富贵功名，或表彰忠孝节义，大都想象丰富，情节曲折，有很高的小说技巧。唐代传奇作家多是诗人，颇有文采，于散体中酌用骈语、韵语，以增加描写的风致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自隋以来，西北各少数民族和西域各国音乐大量传入内地，民间音乐也得到搜集和整理，产生了“杂胡夷里巷之曲”的“燕乐”。唐代成熟的都市文化，追求享乐消费的社会风气，导致了以娱宾遣兴为目的的曲子词的流行，吸引了文人参与创作。李白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二词，虽不离羁情闺怨，而境界阔大，又发挥音律的积极作用，被誉为“百代词曲之祖”（黄升）。中唐一大批文人染指词体，产生了张志和《渔歌子》、白居易《忆江南》、皇甫松《浪淘沙》等大量杰作，然皆属于小令。晚唐温庭筠专注于词体创作，所作《菩萨蛮》、《更漏子》诸词，意象密集，多用装点字面，特重感性显现，使词体脱离传统诗风，走上绮艳和狭深的道路。五代赵崇祚选晚唐、西蜀词为《花间集》，花间词人将温庭筠词风作为传统词风肯定下来，形成流